

通向鄉村革命的橋樑： 三十年代地方師範學校與 中國共產主義的轉型

• 叢小平

國民黨在20年代末完成名義上的統一後，中國教育在30年代經歷了一個快速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鼓勵發展地方師範學校的政策，使得相當數量的優秀農村青年得以接受中等教育，而師範學校的免學費政策則吸引了大批家境貧寒的學生。鄉村青年進入現代教育機構使得小知識份子 (petty-intellectuals) 階層的人數增加，為政治版圖帶來了新的力量對比。本文認為，師範學校在鄉村地區的發展，成為中國共產主義轉型以及共產黨再起的契機。同時，地方師範學校在1927年後，收留了一批逃亡的共產黨員和左翼知識份子，這些人以師範學校為訓練場所，將一大批不滿現狀的鄉村青年培養成中國共產黨的草根幹部，從而為共產黨在抗戰中崛起，動員下層民眾，贏得抗戰勝利奠定了基礎。這些接受了中等教育的鄉村青年成為共產主義中國化，中國革命從城市到農村轉移成功，以及中共最後奪取全國性政權的重要力量。本文試圖將地方師範學校^①作為一種社會機構，考察其在30年代中國社會中的政治角色。筆者希望通過分析教育對社會政治層面的影響，考察共產黨興起過程中一個相當重要，卻被忽視的因素——地方師範學校。研究地方師範學校有理解共產主義革命的中國化以及共產黨興起的深層社會原因，並從新的角度考察二十世紀的變革。這種研究不僅可以豐富我們對當時歷史的理解，而且對於思考當代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一些類似問題也不無助益。

國民黨在20年代末完成名義上的統一後，鼓勵發展地方師範學校。地方師範學校在1927年後，收留了一批逃亡的共產黨員和左翼知識份子，這些人以師範學校為訓練場所，將一大批不滿現狀的鄉村青年培養成中國共產黨的草根幹部，從而為共產黨在抗戰中崛起，動員下層民眾，贏得抗戰勝利奠定了基礎。

一 三十年代學生運動與共產黨鄉村革命的關係

30年代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學生的社會活動和街頭抗議經常是新聞追蹤的熱點。他們利用街頭作為舞台，表達他們的要求和對國家命運的關切。學生的

* 本文是壓縮稿，全文將在《二十一世紀》網絡版刊出。

活動強烈地影響了大眾，在都市贏得了廣大市民的支持，左右輿論的目的取得相當的成功^②。在中國現代歷史敘述中，發動並主導學生運動一向是中國共產黨引以為傲的功績^③，這一點也為美國學術界承認。但是美國學界對學生運動的研究都存在着幾個問題。第一，大多數研究學生運動者，其對象均為位於都市地區的大學生群體^④，未涉及人數眾多的中學生。第二，研究的關注點在於運動本身，忽視了學生運動積極份子的社會和家庭背景，以及家庭背景與其政治傾向是否有關的問題。因此這些研究並未指明城市中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學生運動與下一階段大規模農村革命之間有甚麼必然聯繫。

60年代美國學術界對中國共產黨的詳盡研究受到冷戰問題的驅使。當時美國政界不斷追問「誰丟了中國」，這一政治問題演變成學術問題就成為「共產黨如何興起」或「共產黨如何贏得中國」^⑤。美國學者約翰遜 (Chalmers Johnson) 提出了「農民民族主義」的觀點，認為共產黨在1937年後重振政治和軍事力量，是由於它成功利用了日本的入侵，激發農民的民族主義情緒，共產黨因此發展壯大^⑥。賽爾登 (Mark Selden) 則反駁說，這種觀點過份注重民族主義問題和時機因素，抹殺了共產黨作為革命政黨的性質。他對陝北地區的研究顯示，共產黨的興起不僅是時機和意識形態的問題，而是革命政策回應了農民的要求，主要是土地政策成為贏得農民支持的關鍵^⑦。陳永發卻持不同意見，認為共產黨激進的經濟政策並不一定為農民所接受，而是靠組織階級鬥爭。例如在江南地區，共產黨的成功有賴於組織貧農，鬥爭地主，重新安排原有鄉村秩序^⑧。從70年代開始，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延伸到更廣闊的領域，眾多學者摒棄以單一因素解釋這一歷史現象的方法，試圖引入多元因素。於是，他們的研究從「農民民族主義」，根據地開創與建設，軍事行動，發展到對農民和鄉村社會的研究等等^⑨。

共產主義在中國經歷了從早期城市知識份子的運動到農村革命的轉變，這一點已為中外學術界認同。20年代後期國共分裂，這些激進主義者受到國民黨的鎮壓，被迫由城市轉向農村，共產黨的官方論述也一直將1927年毛澤東的秋收起義作為從城市到農村的轉折點。但是，假如沒有後來抗戰中中共的再起，秋收起義轉向農村的運動就無以為繼，共產主義革命就談不上轉折而是夭亡。中共黨史學者難以解釋的是，在經歷長征等重大挫折之後，中共何以能夠迅速擴大其勢力，動員廣大農民？的確，日本侵略帶來了共產黨東山再起的契機，中共領導人也並不否認這一點，但若無潛在的力量，契機也會失去。官方歷史學者可以解釋說這是由於共產黨正確政策的引導，但在受國民黨和日本控制的絕大多數地區，這些正確的政策是需要有人去執行的。僅從數量上說，1936年延安革命根據地的力量是不足以完成如此重要的戰略布局。而且，上述觀點也未指明，誰是共產黨在鄉村地區的組織者和動員者^⑩。因為這些人才是共產黨革命理想與農民現實主義之間的橋樑。無論吸引農民的是民族主義意識，或是共產黨的革命政策，都需要有具體執行者，要有基層的領導者^⑪。這些基層領導者必須具備一定素質，即理解共產黨的目的和政策，接受民族主義思想，並具有與農民溝通的能力，了解農村狀況，理解農民處境，只有如此，才能將散漫的小農組織成為支持共產黨的力量。那麼，誰是這樣的基層組織者和領導者？是誰將一種源於西方的烏托邦理想、城市知識份子對公正社會的憧憬、一種抽象的

共產主義在中國經歷了從早期城市知識份子的運動到農村革命的轉變。官方論述一直將1927年的秋收起義作為從城市到農村的轉折點。但甚麼人是共產黨在鄉村地區的組織者和動員者？甚麼人將源於西方烏托邦理想的對公正社會的憧憬、將抽象的民族主義觀念轉化為農民理解的語言，轉化為他們對現實和自身利益的關切？甚麼人扮演了共產黨與農民之間橋樑的角色？

現代民族主義觀念轉化為農民理解的語言，轉化為他們對現實和自身利益的關切？是誰扮演了共產黨與農民之間橋樑的角色？儘管歷史顯示，的確有少數城市學生成為農村革命的基層領導者，但這是要經歷一個脫胎換骨的轉變，而且從數量上，也不能說明大規模的鄉村革命。歷史的鏈條在這一點上似乎缺了一環。

二 三十年代中等教育的發展與地方師範學校

國民黨南京政府在戰前十年的成就之一就是教育的擴展。從1927到1937年，高等和中等教育的學校數目均有成倍增長，學生數量亦翻了一番。其中，師範學校數量增加最快，幾乎是1927年前的三倍^⑭。教育擴展是國民黨政府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的一部分，而重點發展師範學校的方針則包含了國民政府控制地方社會，向鄉村社區滲透的用心^⑮。1930年4月，由國民政府教育部召集的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在南京召開。與會者包括省市縣各級教育官員、大專院校校長、教育專家等等。應地方教育官員和教育專家之要求，會議通過了為各級教育機構培養師資，在每縣建立一所鄉村師範學校的提案。此次會議後，教育部正式承認獨立的師範教育體系^⑯，同時還認可了以前帶有實驗性質、私立的(實際上是社會團體創辦的)鄉村師範學校，並將其納入正規教育體系。1932年，中央政府頒布《師範學校法》，進一步將師範學校的獨立性合法化。30年代初，根據《師範學校法》，各級教育管理機關開始着手將師範教育從普通中學中分離出來，使在20年代中師合併浪潮中併入普通中學的師範學校重新獲得獨立。

30年代師範學校的增加使得中等教育的重點轉向了縣一級，尤其在內陸地區。而且師範學校成為地方中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各地中等教育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30年代初期，河南省幾乎每縣都有一所師範學校。在有的縣份，唯一的中等教育機構就是師範學校^⑰。在教育較為落後的偏遠地區，例如甘肅省，師範教育在中等教育中所佔比例達到二分之一^⑱。師範學校在教育發達地區也同樣佔有重要比例：1933年，河北省每縣都有一所師範，而有的縣則有男女師範各一所^⑲。同一時期，師範學校在山東中等教育中亦佔將近一半^⑳。

這一時期教育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是師範學校的急劇增長以及面向鄉村。師範學校的快速增長從1930年開始，但到1933年，正規師範和六年制的鄉村師範突然下降，而簡易師範和簡易鄉村師範數字則相應上升。從1933年開始，簡易師範和簡易鄉師已構成師範學校的主要部分。簡易師範／鄉師是為鄉村設計，主要招收小學畢業或同等學力的當地鄉村子弟。簡易師範／鄉師的增加說明師範學校正向鄉村發展。通過發展地方師範學校，中國教育進行了結構性調整，更加重視鄉村教育，發展方針從完全抄襲、移植美國模式的正規教育轉向建立適合中國鄉村社會的簡易(鄉村)師範。中等師範體系漸次形成，它以數目眾多、位於縣城鄉鎮的簡易師範／鄉村師範為基礎，用以培養初小教師，並有一定數量的、位於省會和大縣城的正規省立師範，用以培養高小教師。於是，一個以普及和提高相結合、簡易師範與正規師範結合、初中程度的縣立簡易師範與高中程度的省立師範結合的合理結構逐漸顯現。

國民黨南京政府在戰前十年的成就之一就是教育的擴展。1932年中央政府頒布《師範學校法》，師範教育開始從普通中學中分離出來。30年代師範學校的增加使得中等教育的重點轉向了縣一級，師範學校成為地方中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30年代初期，河南省幾乎每縣都有一所師範學校。在有的縣份，唯一的中等教育機構就是師範學校。

三 向鄉村貧寒青年打開中等教育的大門

30年代的中學多位於省會、城市或大縣城，有能力的鄉村子弟不得不到城市上中學，而大多數普通農民家庭無力供養子弟去城裏求學。師範教育的擴展導致了中等教育向鄉村延伸，成為廣大鄉村貧寒青年接受中等教育的重要途徑。在河南、河北、江蘇省各個鄉村師範中，農村學生的比例高達70%到90%^⑩。30年代的師範學校實行免學費政策，並提供膳食住宿。而且，學校位於附近縣城、鄉鎮，可以大大減少路費和其他生活費用，因此成為鄉村貧寒學生的首選。30年代，中國農村經歷了許多天災人禍，普通農民家庭沒有能力支付子弟學費和其他費用。在這種情況下，仍然有農家子弟接受中等教育，的確有賴於不斷擴大的地方師範學校為他們提供了難得的機會。當時社會的普遍看法也認為，師範學校學生多來自社會下層，以鄉村貧寒子弟為主。

從清末到30年代的教育改革的確使小學教育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增長，新式小學與私塾並存使鄉村青少年中識字人數增加。30年代，鄉村有相當數量青少年具有基本識字算術能力，其中相當一部分渴望繼續求學。因此，當鄉村師範招生時，入學考試競爭非常激烈。資料顯示，當時河南、山東、河北、江蘇等省師範學校的入學錄取率一般在2-10%，最高也只有15%左右^⑪。對於多數有抱負的鄉村青少年來說，考試入學是他們唯一可以攀登的社會階梯，但這個階梯仍然太窄，僅有很小一部分優秀鄉村青少年得以入選。但對鄉村師範學校來說，通過這樣激烈競爭的入學考試，它們招收到的學生絕對是鄉村青少年中的佼佼者。

師範學校主要為鄉村小學培養教師，因此，學生畢業後大多回到自己家鄉或附近地區任教。鄉村青少年的出路局限於師範，而大多數師範畢業生的出路

在30年代，鄉村師範入學考試競爭非常激烈，錄取率一般在2-10%，最高也只有15%左右。鄉村師範學校招收到的學生絕對是鄉村青少年中的佼佼者。這些學生畢業後大多回到家鄉或附近地區任教。他們面對日益凋敝的鄉村，看到鄉親生活日益困苦，產生強烈的不滿，遂萌發社會變革的要求。圖為民國初年的鄉村學校。



30年代地方師範學校的學生大多出身貧寒，都是鄉村青少年中的佼佼者；但困守鄉間，幾乎沒有改變自身狀況的可能。在他們進入師範學校後接觸到激進的社會理論，開始反思鄉村社會。由於國民黨政府對日政策軟弱，使得共產黨激進的革命政策與民族主義更有吸引力，因而他們也更易接受共產黨對鄉村問題的解決辦法。共產黨組織注意到了這個群體，將其發展為中共的基層力量。

也就局限於當鄉村教師。儘管有少數鄉村青年通過師範學校的途徑考入大學^②，但總的來說，這種例子如鳳毛麟角，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小學教員屬於低薪階層，他們極少有可能湊足上大學的費用。而且地方當局常常拖欠教師的薪水，導致30年代小學教師罷課索薪浪潮此起彼伏^③。第二，大多數師範生在畢業後，均已到了成婚年齡，在鄉村教書幾年以後，家庭負擔接踵而來，因要養家糊口，就更不可能繼續求學。第三個困難在於師範學校與普通中學的課程重點不同，師範學校課程專為教小學而設置，許多課程過於簡略或根本未設，成為師範生考大學難以超越的障礙。第四，在鄉村小學教過幾年最基本的語文算術之後，他們和過去學過的知識已有距離，而且沉重的教學負擔佔去了他們的時間與精力，無法複習考試科目，日新月異的現代城市和知識已將他們拋諸身後，使他們很難與城市學生競爭。然而，即使他們自己逃脫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命運，面對日益凋敝的鄉村，看到鄉親生活日益困苦，他們會產生強烈的不滿，遂萌發社會變革的要求。

四 培養革命者的溫牀：山東、河北的地方師範學校

30年代地方師範學校的學生有着一些共同特點。首先，他們大多來自貧寒家庭，不少學生家庭經濟每況愈下。第二，他們都是鄉村青少年中的佼佼者，通過激烈競爭的入學考試就證明了他們的能力，使這一批人有優越感。同時他們也有不平感，因為他們考入師範本身就體現了社會的不公：因其優秀而通過考試，本來可以有更好的前途，無奈只是由於經濟困難而不得不入師範。第三，展望前途，他們已注定要困守鄉間，拿着低薪，貧苦終生，與城市的知識界少有溝通，而且幾乎沒有改變自身狀況的可能。第四，進入師範學校後，他們接觸到了一些現代思想，一些激進的社會理論，使他們開始對鄉村社會進行反思。師範學校是他們接觸外部的窗口，給他們一個機會了解自己村莊以外的世界。30年代國民黨的現代化政策注重城市發展，雖然在城市中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他們在重建鄉村中卻遇到困難，尤其是鄉村經濟凋敝，社區瓦解等問題難以解決。這些青年們從自身處境出發，感到國民黨的現代化和鄉村政策並未改善自身和家人的狀況，反而使其日益困頓，於是他們要求變革，一種不同於國民黨政府注重都市現代化政策的變革。第五，由於國民黨政府對日政策的軟弱，使得共產黨激進的革命政策與民族主義更有吸引力，因而他們也更易接受共產黨對鄉村問題的解決辦法。另一方面，20年代末大革命失敗後，一批左翼知識份子逃離城市，隱匿於鄉村學校，將激進社會思潮帶入鄉村並組織各種社會活動。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思想似乎對這群不滿現狀的學生更具有吸引力。共產黨組織注意到了這個群體，將其發展為中共的基層力量。

下面考察山東、河北地區師範學生在30年代的激進活動，主要資料來源於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於1992至1994年出版的《師範群英 光耀中華》(以下簡稱《師範群英》)。這是一部關於師範學校及學生的事迹報告暨傳記匯編，共有二十

一卷。關於河北、山東的師範事迹集中在第七和第八卷。在山東，師範學校幾乎佔到中等教育的一半，在河北，師範學校佔中等教育三分之二。《師範群英》中的報告和傳記均收集於90年代初，許多篇章或是基於原始資料，或是經過對當事人採訪後撰寫，屬於授權傳記，有的是本人的回憶錄，屬自傳性質。這些傳記、自傳和回憶錄的形成有其歷史資料的基礎。傳記寫作是由當地師範學校教師、地方史資料館、檔案館人員在參考地方志、當時報刊資料、地方檔案、校史、個人回憶錄的基礎上寫成的。自傳和回憶錄的部分大多是受邀寫成。因此，大部分史實應當可靠。當然，此書亦有其缺點，第一，正如本書書名所指——「群英」——已經說明這部書集的基調，即歌頌革命英雄，其史料的觀點和敘述方式已受到革命話語的主導，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大部分人的事迹均是革命勝利的讚歌。因此我在鑑別資料時，捨棄了相當部分內容，以期減少共產主義革命話語的影響。其次，在既定的歷史環境下，敘述人有可能重塑其記憶的現象。因此，我在選擇資料時，盡量側重事實，減少敘述和對事件的定性。儘管有以上種種問題，此書仍有重大價值，尤其在個人家庭出身、經歷、社會活動方面為我們提供了有用的信息^②。它講述了山東、河北30年代一群師範學校出身的共產黨基層幹部的經歷，從他們為何進入師範，如何接受革命影響，到何時何地加入共產黨，進行過甚麼樣的活動，等等，這些信息本身提供了我們了解30年代共產黨在鄉村師範學校活動的線索。但是本文並不能提供數字性的統計資料，確切地說明有多少共產黨幹部來自師範生，更為準確的資料也許有待於共產黨內人事檔案的公開。

(一) 地方師範：心懷憤懣的鄉村青年聚集之所

在《師範群英》第七、八卷中，河北、山東兩省的人物大多來自鄉村。我們從他們的傳記中可以看出，大多數人來自中等甚至中等以下的小農家庭^③。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這些人多處於青少年階段，而且許多人都遇到家庭經濟困難以及其他問題，受教育經歷甚為坎坷。許多人小小年紀就得從事農作。在此二卷中，許多人都講述着同樣的故事：一邊上學，一邊在田間耕作。不少人都因家庭經濟困難而輟學的經歷，可見大多數人的家境並不富裕。在《師範群英》第七、八卷中所包括的山東、河北兩省的前師範生中，來自赤貧家庭和富裕家庭的人都是少數，絕大多數人都是因為家庭經濟困難，上不起普通中學，才不得不進入師範的。師範學校幫助這些有才華的鄉村青少年解決困難，使他們能夠接受中等教育。

相同的家庭背景和艱苦的求學經歷，使得學校的農家子弟有着共同語言，形成了無形的交往圈子，激發了其階級意識。一方面他們對自己貧寒的家庭背景十分敏感，另一方面這些師範生還有強烈的優越感，因為他們畢竟是從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的。而且，他們從小就以聰敏好學聞名鄉里，許多人在縣城高小讀書時總是名列前茅，家庭及鄉親對他們寄予厚望，也培養出他們不甘命運的精神和對家鄉社區的使命感。但是，這些志向遠大、聰敏好學的青少年卻不得不面對階級分化的現實，這種挫折感常常會表現出來。例如鐵瑛在讀書

30年代的師範生一方面對自己貧寒的家庭背景十分敏感，另一方面有強烈的優越感。這些青少年面對階級分化的現實，他們積累的挫折感和對社會的不滿需要某種引導方能成為社會力量，而30年代，他們正是在地方師範學校裏遇到了引導他們的人。第一代的共產黨員在1927年國共分裂後流向農村，師範學校成為這些逃亡知識份子理想的避難所。

時，從開始作文抨擊社會的不公，譴責階級壓迫，表達出對平等美好社會的嚮往，到最後發展為積極從事激進的社會活動^②。

(二) 地方師範：逃亡共產黨人再生之地

這些鄉村青年積累的挫折感和對社會的不滿需要某種引導方能成為社會力量，而30年代，他們正是在地方師範學校裏遇到了引導他們的人。第一代的共產黨員在1927年國共分裂後，以不同方式流向農村。一部分人參加了毛澤東的農民起義、從事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工作，但也有一部分人未能去根據地，而躲在偏僻的鄉鎮或農村。另外，在國民黨「清共」擴大化的情況下，一些受到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影響的進步知識份子^③也被迫離開城市，逃往鄉村。這些共產黨員和進步知識份子來到鄉村，藏身學校，以教書謀生。此時正逢國民黨在鄉村擴大師範教育，招募教師，於是師範學校成為這些逃亡知識份子理想的避難所。中央政府對大城市以外地區控制鬆懈、地方官僚的無能懶惰、鄉村缺乏教師以及地方人情關係網，諸多因素都有利於這些逃亡者在學校裏藏身。

共產黨員和進步知識份子藏身學校的情況在當時的新聞報導中可見一斑，其時常有報刊報導某些學校教師被指控為共產黨^④，這些指控既有「清共」擴大化造成的冤案，但許多案件也是確有其事。根據《師範群英》第七、八卷，山東和河北的師範教師中就有不少共產黨人，如山東二師的王哲，一師的李竹如、徐步雲（陶純）、袁和清、王俊千、韓琴南、祁蘊樸、石逸民、王丹忱、李清泉、周愛舟、吳天墀，四師的馬石安，五師的馬宵騰，等等。河北的情形也如此：河北（大名）第七師範的馮品毅，保定的第二師範的趙瑞五，等等，均為共產黨員。

與此同時，地方上有一批受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薰陶的進步知識份子，因不滿國民黨政府1927年後突然向右轉，也成為共產黨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例如山東第二師範校長范明樞、濟南鄉村師範校長鞠思敏、山東第三師範校長及六縣聯立鄉師校長孫東閣、文登鄉師校長于雲亭、山東省立第一師範校長兼教務長王祝晨、河北第七師範校長謝台臣、教務長晁哲甫、第二師範校長張宵騰、第四師範校長孟憲禔，等等。這些同情共產黨的校長、教務長都是地方名人，他們利用自己的權力和影響，聘用共產黨員和左翼知識份子，在教師或學生遇到地方政府騷擾或逮捕時，想方設法保護和營救他們^⑤。

這些逃亡鄉村的共產黨員和左翼知識份子將學校作為他們繼續從事革命活動的新戰場，並且積極地利用各種方式吸引學生參與。從《師範群英》的大多數篇章來看，這些共產黨員教師在學校的活動有着共同的特徵。首先，他們利用師範學校的正式課程，傳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理論，把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介紹給學生，並分析當下農村經濟狀況和社會階級狀況，然後鼓勵學生在假期回鄉時做社會調查，再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加以分析^⑥。其次，他們組織讀書會、文學社團，吸引愛好文學的青少年。通過讀書

師範學校的共產黨員教師利用正式課程，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介紹給學生，又組織讀書會、文學社團介紹左翼作家的作品。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甄選出一些思想激進、活動力強的學生，介紹到共產黨外圍組織，然後發展他們入黨並建立地方支部。一個學校只要一兩位這樣的教師和一群追隨他們的學生，一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就建立起來了。

會，他們將一些左翼作家的作品介紹給學生，指導、鼓勵學生思考社會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甄選出一些領悟力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思想激進、活動力強、人品可靠的學生，先介紹他們參加共產黨外圍組織，如「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左聯」、「抗日救國會」、「反帝大同盟」等等，然後發展他們入黨並建立地方支部。一個學校只要有一兩位這樣的教師和一群追隨他們的學生，一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就建立起來了。

(三) 培養學生活動份子的溫牀

在共產黨員和進步教師的引導下，在同情共產黨的校長保護下，地方師範學校成為醞釀和滋生激進思想的溫牀、社會活動的中心。從《師範群英》中的篇章，我們可以了解他們所受到的影響。《師範群英》中的人物在他們的傳記或自傳中提到過一批30年代在師範學生中流傳的書籍雜誌，五十年之後他們仍記得當年讀過這些書籍雜誌，應該說，這些書籍雜誌對他們政治觀點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②。從這些流傳的書刊中，我們可以看到30年代共產黨和左翼文化人對師範學生的影響力。這些書刊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中國和日本學者寫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入門書，如艾思奇、河上肇的著作。文學方面有五四作家和左翼作家，包括魯迅、郭沫若、曹禺、巴金、茅盾、蕭軍、蕭紅以及蘇聯左翼文學家，如高爾基 (Maksim Gorky)、綏拉菲莫維支 (Aleksandr Serafimovich) 的作品等等。雜誌方面以左翼和中間偏左的文人所辦的雜誌，如鄒韜奮主編的《社會周刊》、蔣光慈主編的《拓荒者》、丁玲主編的《北斗》最受歡迎。山東的共產黨員知識份子利用同情者的掩護，建立了「書刊介紹社」，專門購入上海、北平出版的左翼書刊，再轉輸山東各地的學校，將當時左翼文學作品和共產主義理論書籍介紹給當地學生。30年代的文獻也證實，《師範群英》提到的這些革命、左翼書刊，當時的確流傳於不少師範學校之中。國民黨政府每年都給地方下達一個禁書單，其中不僅禁止以上書刊，而且包括除共產黨外的其他政治組織的書籍刊物，甚至連國民黨左翼人物和社會改良人物的書籍也在禁止之列。1931至1932年間河北保定警察局在一次檢查幾個師範學校的郵件時搜查到的違禁刊物，均屬共產黨刊物，可見共產黨組織在當地師範學校中十分活躍^③。

誠然，與當時師範生的總數相比，《師範群英》中提到的人物屬於少數，就算把沒有列入記錄的學生黨員和積極份子都包括在內^④，他們在整體學生和在大多數學校中仍是少數。可是，這並不影響他們對學校政治文化的巨大作用。美國學者易社強 (John Israel) 在研究30年代學校政治活動時發現，一所學校只要有10%的學生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就能主導這所學校的政治氣氛。在一個地區，只要有少於1%的學生積極份子，就能左右這個地區的學生組織和學生運動^⑤。山東、河北地區師範學校的活動證實了易社強的判斷，而事實是，大部分地方師範學校中學生活躍份子都超過了易社強所說的比例，例如，山東第三鄉師學生總數不過一百六七十人，但受學校中共黨組織吸引的積極份子學生就有六七十人^⑥。1933年，文登第七鄉師有三十多名學生黨員，佔學生總數的五分之一，還

美國學者易社強發現，一所學校只要有10%的學生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就能主導這所學校的政治氣氛。山東、河北地區大部分地方師範學校中學生活躍份子都超過了易社強所說的比例，例如，山東第三鄉師學生總數不過一百六七十人，但受學校中共黨組織吸引的積極份子學生就有六七十人。在河北第七師範，據說有八成的學生捲入了共產黨領導的政治活動。

師範學生成為地方革命領導人的另一個重要步驟是回鄉。他們回鄉教書後所以成為地方領袖並非偶然，這是因為他們出身農家，知道怎麼將民族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革命的大目標翻譯成農民理解的語言；也知道甚麼政策能吸引更多農民參加抗日。他們在鄉親中有聲望、有號召力，他們作為地方教師和文化人，受到尊重，教師身份也利於他們和學生家長交流。

不包括參加共產黨外圍組織的進步學生^⑤。在河北第七師範，據說當時有八成的學生多少捲入了共產黨領導的政治活動^⑥。

《師範群英》中所記載的人物，在成為革命者的過程中都經歷了如下幾個步驟：首先，他們在學習中一般性地了解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表現出極大興趣，並積極地參與社會調查，利用這些理論分析鄉村社會。在此過程中，他們也許對社會不公表現出比一般學生更強烈的憤慨，受到共產黨員教師或同學的注意。其次，他們被邀請參加學習小組、讀書會、文學社團，以及社會活動團體，如「民先」、「左聯」等團體，這些團體往往是由共產黨員教師或學生指導或領導。在這些組織內，他們進一步了解共產黨的主張、社會革命的必要性、共產黨組織和最終理想，以及被認為是中國前景的、被理想化的蘇聯社會狀況。然後，他們捲入具體的政治行動，組織罷課、示威遊行。最後，在一系列活動中表現積極的學生被吸收入共產黨^⑦。

師範生在30年代所參加的社會政治活動，目標和範圍有可能是全國性的、政治性的，如抗日遊行請願、抵制日貨、抗議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等等。這些活動往往是校際間的聯合行動，響應全國運動。地方性的跨校活動也可能是非政治性的，如反對會考、反對軍訓等等。相當部分抗議活動是在校內進行的，如某些活動針對校領導貪污腐敗、校方僱用無能教師、學校伙食惡劣、教師保守歧視、學校無故開除學生、學生之間的衝突等等。當然，也有地方性的政治活動，如組織附近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暑期回鄉動員鄉民抗捐，等等。但這種激進的政策隨着共產黨提出聯合陣線後有所緩和。在30年代，大多數政治活動屬於校際之間的聯合行動，並多以抗日為主題。「九一八」後，這些活動使民族主義情緒走向高潮，將眾多原本政治意識不強的學生捲入其中，而校內的非政治活動也常常有團結學生、動員群眾、給保守校方找麻煩的意味。通過這些活動，學生活動家學會了如何組織群眾、傳遞信息、表達訴求、製造輿論、互相聯絡、動員力量，這種訓練最終成為他們下一階段組織抗日游擊隊的寶貴經驗。在這一系列的活動中，一部分學生參加了共產黨和共青團，大部分學生積極份子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如「民族解放先鋒隊」、「抗日救國會」、「反帝大同盟」、「左聯」等等。這部分人中的大多數在抗戰爆發後也加入了共產黨。這些活動為共產黨在抗戰中崛起訓練了骨幹力量。從以上山東、河北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30年代共產黨如何滲透地方師範學校，如何引導和組織學生，將其塑造為革命的溫牀。我們也可以想像，其他地方的師範學校也有相似的經歷，但由於篇幅、資料等因素的局限，本文未能涉及。

(四) 從學生活動家到鄉村抗日組織的領袖

師範學生成為地方革命領導人的另一個重要步驟是回鄉。在本文第三部分中提到，絕大多數師範生畢業後，回到自己家鄉或附近村鎮教書。他們成為地方領袖並非偶然，首先，因為他們出身於當地農家，了解地方風俗語言，可以用同一種語言和農民溝通，知道怎麼將民族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革命的大目標翻譯成農民理解的語言。其次，他們從自己的經歷中體會到鄉村生活的艱辛，

懂得農民的疾苦，知道他們想要的是甚麼，知道甚麼政策能吸引更多的農民參加抗日。第三，他們從小讀書就是同類中的佼佼者，被家庭、村民寄予厚望，代表着家族和村莊的榮耀，使他們在鄉親中有聲望、有號召力。第四，他們回鄉後，被看成是讀過書、見過世面的人，作為地方教師和文化人，他們受到尊重，教師身份也利於他們和學生家長交流。這些都是他們成為地方領袖的必要條件。而且，如上文提到，在鄉村中存在着一大批青年，他們雖然接受過幾年基本教育，但未能接受高小或中等教育，屬於在投考師範學校中被淘汰的大多數。他們所受的教育使他們有能力與地方教師溝通，理解一些基本的社會概念，同時，他們也對生活現狀不滿。這批人既是地方教師的同齡人，又可能是親戚、同鄉、兒時玩伴、小學同學，因而最可能成為地方教師進行動員的主要對象。當然，對這批人的動向有待進一步研究，也許能幫助我們了解除師範畢業生以外的中共基層幹部。

在筆者所研究的四十三名其後成為共產黨幹部的30年代山東師範學校學生中，有二十四人回到鄉村，成為小學教師，二十八名先後組織或加入了地方游擊隊。其中十四位人物先後去了延安，其他人有的進入共產黨在山西等地舉辦的訓練班或學校。在延安，他們或在抗大接受政治軍事訓練，成為軍事指揮員，或進入中央黨校、馬列主義學院進一步學習理論。然後被派往敵後，或派回家鄉從事組織動員群眾的工作。30年代後期，他們中多數為縣區領導，40年代成為縣級以上及地區領導。前山東平原鄉師學生王克寇的經歷有助於我們了解這批地方領袖的成長：王1933年入鄉師學習，1936年在鄉師入黨，1937年夏畢業後回到本縣任教，同時進行抗日動員和組織活動。1937年底日軍佔領其家鄉時，王已經擁有一支很小的游擊隊，後來又兼併了其他各種地方武裝和民間抗日力量，包括改造一支土匪隊伍。1938年初當共產黨中央派代表進入該地區開闢敵後根據地時，王被任命為家鄉(禹城)的縣委書記，後為魯西北特委武裝部長，1939年為魯西游擊大隊政委，1940年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八路軍冀魯豫四分區基幹二團，為地方主力，王任團政委^⑧。王是山東師範學校抗戰前最後一批畢業生，在他之前的黨員學生已回鄉任教並從事動員群眾的工作，在他之後的激進學生抗戰爆發時仍然在校，於是，他們或直接投入游擊戰，或投奔延安，然後再回鄉從事抗日活動。周錫瑞(Joseph Esherick)利用40年代後期的資料(1948-1951)研究了陝甘寧邊區延長縣鄉村基層幹部的家庭出身，試圖了解共產黨基層政權的結構。他認為，陝甘寧根據地的幹部有不同背景：上層階級和知識份子出身的幹部處於中央和省級領導地位，貧農出身的幹部在縣級，中農出身的幹部在區鄉村各級^⑨。《師範群英》的資料顯示，30年代後期，大部分師範學生出身的共產黨幹部出任區、縣、地區級領導，到40年代中後期，這批幹部大多已經成為縣以上或地區以上的領導。很有可能他們所動員的鄉村青年接替了他們在村鄉各級的職務，成為基層領導，然後在40年代後期根據地擴大後有的晉升為縣級領導。若是這樣，就與周錫瑞所說的結構是一致的。而且，從30年代後期到40年代後期幹部的結構變化，我們可以看到共產黨組織基於年資的分層現象(layers)。例如，在筆者上述所研究的四十三名山東師範學校學生中，他們參加革命後，少數人在戰場上犧牲了，多數人經歷了抗戰和內戰，

周錫瑞認為陝甘寧根據地的幹部有不同背景：上層階級和知識份子出身的幹部處於中央和省級領導地位，貧農出身的幹部在縣級，中農出身的幹部在區鄉村各級。《師範群英》的資料顯示，30年代後期，大部分師範學生出身的共產黨幹部出任區、縣、地區級領導，到40年代中後期，這批幹部大多已經成為縣以上或地區以上的領導。這與周錫瑞所說的結構是一致的。

1949年後成為共產黨重要幹部，許多人不是部局首長、院校校長，就是將校軍官、省市領導。

五 結 語

本文討論了30年代教育擴展與政治勢力的微妙變化。在國民黨政府發展鄉村師範、擴展鄉村教育的政策下，一大批貧寒鄉村青少年得以接受中等教育。但是，這些青少年個人和其家庭處於不利的整體大環境。天災、鄉村經濟凋敝、民族主義的興起，以及國民黨政府失敗的鄉村政策，在在都使得這些優秀的鄉村青年不滿。從個人角度來說，他們自覺優秀，卻不得不接受次一等的教育，將來出路極其有限，而且作為鄉村小學教師，待遇極差。他們並未感受到國民黨政府現代化政策的好處，反而覺得被困鄉里。另一方面，進入地方師範把他們帶出原有的鄉村社區，使他們視野開闊，通過師範學校這個窗口，他們接觸到了現代知識和各種社會理論，了解到了不同的解決方案和社會前景。

如果要為共產黨人排列譜系的話，筆者則將30年代的激進青年學生歸於第二代共產黨人，他們與第一代共產黨人有着顯著的區別。第一代共產黨人大多出生在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年的舊鄉紳家庭，受過良好的傳統教育，又有機會在大城市接觸現代生活和新式教育，在整個1910年代中他們不斷汲取了陸續傳入的各種西方思潮，又經歷了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激進主義的高潮。因此他們的共產主義的知識更為直接和全面，對共產主義的理解更傾向於將其作為一種社會理論，他們的行動更多的是書寫、呼籲、傳播，確實為一種城市知識份子的運動^⑩。第二代共產黨人則多為出生於1910年代的鄉村一般小農家庭，他們所受的教育頗為雜蕪，既有私塾教育，也有新式教育，且教育過程時斷時續。由於地理環境和家庭背景的限制，他們的文化程度大多限於中等教育，甚至更少。他們更多的是通過左翼文學作品和社會主義入門書籍了解馬克思主義，而且，他們了解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更多的是列寧主義式的，是經過第一代共產黨人選擇、消化的理論。這就注定他們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解是間接的、片斷的，導致他們激進的動力並非出於理論的極端化，而更多的是出於他們自身的社會背景和親身經歷。在30年代的形勢下，他們已經不可能對西方理論作更多的學理上的探討，社會和時代要求他們有所行動，抗日救亡刻不容緩。所以，第二代共產黨人更多的是「行動的一代」。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才不可能把某種理論視為教條，而是更多地從實踐中去理解理論、修正理論。同樣的，他們也最有可能以實踐行動背離抽象理論，這樣就促成了共產主義的中國化。

然而，從更廣闊的層面上，我們可以將這種政治變化看成是不同的社會力量尋求社會轉型的不同解決方案。從晚清到民國，無論改良還是革命，我們看到的都是上層知識精英主導的社會改革方案，這種方案往往注重城市的現代化建設，加速了鄉村經濟的衰落和社區的瓦解，加大了社會分化與貧富不均，讓農村和農民為現代化付出代價。這種現象在90年代大陸地區的改革中又重新出

從晚清到民國，無論改良還是革命，我們看到的都是上層知識精英主導的社會改革方案，這種方案往往注重城市的現代化建設，加速了鄉村經濟的衰落和社區的瓦解，加大了社會分化與貧富不均，讓農村和農民為現代化付出代價。這種現象在90年代大陸地區的改革中又重新出現。

現。30年代的鄉村青年通過參與現代教育，使得小知識份子階層壯大，他們的出身與利益使其易於與農民結成同盟，並成為下層利益的代言人，抗衡以國民黨為代表的上層精英，這種對立最終導致社會革命。在此過程中，日本侵略帶來了時機問題，並導致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但只有在共產黨培養了相當數量的基層力量可作為革命運動的橋樑，使革命目標和政策、民族主義意識能夠達到下層廣大農民，同時又能將下層利益訴求即時傳達到上層，修正上層政策，以利於團結最廣泛的社會階層，日本侵略和民族主義高漲造成的機會才可能被充分利用。

註釋

- ① 所謂地方師範是包括省立、縣立和多縣聯立的中等師範、簡易師範、師範講習所、鄉村師範、鄉村簡易師範、鄉村師範講習所、速成班等培養教師的機構。這些師範學校，除少數位於省會城市外，多位於縣城和鄉鎮。
- ② Jeffrey N.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5.
- ③ 許多學生運動史被當成黨史的一部分來論述。如《上海學生運動大事記，1919-1949》(上海：學林出版社，1985)。
- ④ 如華志堅(Jeffrey N. Wasserstrom)就專注於上海的學生運動。見*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 ⑤ 最近，胡素珊(Suzanne Pepper)對這一討論進行了歷史性回顧，見Suzanne Pepper, "The Political Odyssey of an Intellectual Construct: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the Study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History—A Review Essa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3, no. 1 (February 2004): 105-25.
- ⑥ Chalmer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chap. 1.
- ⑦ 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在賽爾登之前，基林(Donald Gillin)對山西的研究就指出，抗戰前，共產黨的激進政策在當地就很受歡迎。見Donald Gillin, *Warlord: Yen Hsi-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 ⑧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3-16.
- ⑨ 胡素珊指出，約翰遜的單一因素觀點不能解釋抗戰以後共產黨的繼續發展，難以解釋為何在激發民族主義的因素消失之後，共產黨仍然能取得全國勝利。但胡素珊認為，對約翰遜的批評和後續研究發展出多元解釋，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這一歷史時期的知識。她也指出以目前的研究來看，任何認為可以對這一問題作出結論的想法都還言之過早。見"The Political Odyssey of an Intellectual Construct"。
- ⑩ 撒克斯頓(Ralph Thaxton)認為，共產黨在抗戰中的成就並非動員農民，響應抗戰，而是認同農民的利益，並沒有將革命化的政策或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強加於鄉村社會，反而須要適應、認同鄉村的風俗文化。見Ralph Thaxton, *China Turned Rightside Up: 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in the Peasant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胡素珊指出，撒克斯頓的觀點成為約翰遜關於共產黨靠抗戰興起論點的「反題」(antithesis)，即共產黨在鄉村的活動不僅未能受益於日本侵略，反而受其阻礙。見"The Political Odyssey of an Intellectual Construct"。撒克斯頓認為共產黨的基層領導來自本地一些與外界有聯繫的人，如季節工、曾在城市打工者。他也注意到了村中的師範生成為當地基層領導，遺憾的是，他並未深究這些師範生如何成為地方基層領導。

① 基廷 (Pauline Keating) 和周錫瑞 (Joseph Esherick) 的研究顯示共產黨要贏得農民的支持，必須使其政策符合地方的實際情況，符合地方人民的需要。由於各地的情況不同，執行政策的過程相當程度上依賴於基層幹部的靈活掌握。見 Pauline Keating, "The Yan'an Way of Co-oper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0 (1994): 1025-51；以及 Joseph Esherick, "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Gulin County in the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0 (1994): 1052-79。周錫瑞對陝甘寧邊區固臨縣鄉村基層幹部的研究指出，超過百分之五十的當地各級幹部是在1934至1936年共產黨實行激進政策時參加革命的，實際上否定了約翰遜的觀點，肯定了賽爾登的研究。見 "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② 以上數字均見《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北京：商務印書館，1948)，頁1400、1429；《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上海：開明書店，1934；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重印，1971)，卷四，頁133。

③ 關於社會組織利用鄉村師範學校進行社會改造，以及國民黨政府利用地方師範進行鄉村政權建設的研究，見叢小平：〈社區學校與基層社會組織的重建——二三十年代的鄉村教育運動與鄉村師範〉，《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八期(2002年11月)，以及 Xiaoping Cong, *Teachers' School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State, 1897-1937*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forthcoming, 2007), chaps. 4-5。

④ 1922年的教育改革雖然並未取消師範學校，但在教育正規化、標準化的政策下，以提高教育質量為名，將師範學院改為綜合大學，中等師範學校併入中學或改為普通中學。到1927左右，中等師範只剩二百多所。1930年，全國高等師範從原來的六所減少為兩所：即北京師範大學和北京女子師範大學。

⑤ 河南教育廳：《河南地方教育視察報告(1934)》(河南省教育廳印行，1934)，卷一。

⑥ 莊澤宣：〈甘肅教育現狀一瞥〉，《中華教育界》，卷二十四，第七期，頁157-63。

⑦ 教育部：〈河北省教育視察報告〉，見《教育部視察員視察各省市教育報告匯編》(教育部印，1933)，1933。

⑧ 見張書豐：《山東教育通史(近現代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頁199-208。

⑨ 培芝：〈本校二十二年度入學試驗的研究〉，《鄉村改造旬刊》，卷二，第十三、十四期合刊(1933年8月)；《河北省立大名師範一覽》之〈學生家庭職業統計圖〉，河北省檔案館；江蘇省教育廳編審室：《江蘇教育概覽(民國二十一年)》(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重印，1971)，頁368-422。

⑩ 培芝：〈本校二十二年度入學試驗的研究〉；呂孟軍：〈劉國柱：倥傯平生情未了〉，載李鍾善等編：《師範群英 光耀中華》，第七卷(下冊)(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頁68；王若望：《王若望自傳》(香港：明報出版社，1991)，頁53；《江蘇教育概覽(民國二十一年)》，頁441。河北泊頭師範校史編寫組：〈任雲閣：投筆從戎 血灑長空〉，載《師範群英》，第八卷，頁85；鐵瑛：〈保定二師求學紀實〉，載《師範群英》，第八卷，頁93。

⑪ 例如，山東第一師範的學生劉震，在完成一年的服務之後，考上了山東大學。50年代的名演員項堃，也是山東第一師範的學生，畢業後當了一年教師，然後考上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見丁更新：〈劉震：齊魯教育戰線上的「老戰士」〉，載《師範群英》，第七卷(上冊)，頁264；丁濤：〈項堃：譽滿神州的一顆電影巨星〉，載《師範群英》，第七卷(上冊)，頁353。

⑫ 〈河南小學教員罷課潮〉、〈南北教員索薪運動之紛起〉、〈小學教員之索薪運動〉，分別載《教育雜誌》，卷二十二，第二期(1930年2月)，頁130；第十期(1930年10月)，頁125-26；卷二十三，第三期(1931年3月)，頁129。

⑬ 我認為這些前師範生在講述個人家庭出身，接受教育，加入革命，與進步教師的接觸聯繫，入黨時間地點，在共產黨內從事的工作、職務等等，應該相當可信。

因為從40年代的整風，50年代的職務評級，60、70年代的文革，80年代的退休證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歷史審查迫使中共幹部一次次回憶並證明他們的經歷，尤其是在文革中，他們多次被迫交代個人歷史細節，其經歷都被紅衛兵調查得清清楚楚，任何不實細節或含糊其辭都可能成為致命的錯誤。到80年代，這些人必須證明自己早年的經歷，提供證明人，以獲得按不同年資規定的退休福利。所以這些資料應該可以引用。

⑳ 這些前師範生對自己家庭狀況的描述可能與事實有出入，但應該不會太大，因為報告、傳記和回憶錄均完成於90年代初，那時家庭成份政策撤銷已有十餘年，承認家庭富裕並不會帶來麻煩，誇耀家庭貧困也不會帶來好處。

㉑ 鐵瑛：〈保定二師求學紀實〉，載《師範群英，光耀中華》，第八卷，頁89-101。

㉒ 我將進步知識份子定義為受左翼思潮影響和同情共產黨的學者、作家、文化人、教育家、教師等等。

㉓ 30年代的《教育雜誌》中有不少學校教師被指控為共產黨而遭到逮捕的報導，如1930年10月號的〈教育界黨獄之蔓延〉；同年12月號的〈學校黨獄之蔓延〉；以及1931年2、3月號的〈教育界黨獄之餘波〉。

㉔ 見《師範群英》，第七、八卷有關篇章。

㉕ 賈學春：〈王哲：在萊陽鄉師的革命活動〉，載《師範群英》，第七卷(上冊)，頁99-115。

㉖ 左翼書刊對師範生的影響也有重塑記憶的問題，考慮到他們對這些書籍刊物的理解可能是隨着他們在共產黨內的經歷而逐步加深的，所以，我列出了這些書刊，試圖說明當時這些書刊流行的狀況，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些書刊可能對他們發生的影響，而不偏重討論如何發生影響，或發生多大的影響，更不採用作者或傳主本人的說法。

㉗ 河北當局每年都下發禁書名單給各個學校，督促他們幫助查禁違禁書刊，每份禁書單都長達幾十頁，文件標題宗旨明確，如《嚴禁反動宣傳(1930)》、《嚴禁反動刊物(1932)》、《查禁反動宣傳(1933)》。文件見河北省檔案館。

㉘ 《師範群英》卷七並未囊括山東省師範學校中所有參加革命的進步師範生，許多學生積極份子，甚至後來成為共產黨高級官員的人物都沒有給予單獨的篇章，而只提到其姓名和在49年以後的職務。例如，前山東省長趙健民、前七機部部長景曉村、前中央紀委第一書記于毅全、前河南及黑龍江省委書記潘復生、前山東省委書記高奇雲、前上海市委書記王一平、原黑龍江省政府機關黨委專職副書記邵汝群、北京軍事博物館館長劉漢、前昆明軍區副司令員劉春山、原商業部副部長任泉生、原總後勤部副部長白相國、原營口市委書記宮霞光，等等。卷七還提到另外近百名學生積極份子，但並未提供有關他們參加革命的經歷以及現況的具體細節。

㉙ John 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7.

㉚ 見楊英煦、李天星、朱林海：〈趙昭：銀雀山下的火炬〉，載《師範群英》，第七卷(上冊)，頁315。

㉛ 見李進法：〈王振華：兢兢業業為教育〉，載《師範群英》，第八卷，頁29。

㉜ 黃淑和、呂孟軍：〈谷牧：為了新中國的誕生與繁榮〉，載《師範群英》，第七卷(上冊)，頁330。

㉝ 在大多數人的回憶或傳記中，個人經歷和參加共產黨的過程都非常相似。

㉞ 王朝璽：〈王克寇：烈火青春〉，載《師範群英》，第七卷(上冊)，頁380-91。

㉟ Esherick, "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㊱ 毛澤東似乎是第一代共產黨人中的異數。而第二代共產黨人的家庭背景和早期經歷都與他有相似之處，所以，毛在30年代成為中共領袖不能說僅是一種巧合。